

真實存在卻被視而不見的街頭日日： 評《危殆生活》

洪意凌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危殆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黃克先著，台北：春山出版，2021年11月，416頁。

在關於都市邊緣人的寫作中，有些描繪邊緣人之間的情誼與互助（Duncier 1994），有些說明對尊嚴的追求何以反而讓人身陷犯罪（Bourgeois 1995），黃克先則刻劃出一個需要更多討論的面貌——「危殆」：不穩定、難以預測且危機四伏。

艋舺公園裡，坦坦人、做事人、艱苦人組成了自有秩序的社會世界。為何公園的無家者過著危殆的生活？《危殆生活》一書從無家者如何看待及運用「連帶」來回答這個問題。在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裡，連帶存在於無家者之間，也存在於無家者與幫助網絡之間。然而，無家者之間的連帶其實使無家者更加脆弱，許多無家者抱持著將就的心態與其他無家者建立關係，卻也在關係中埋下不安的因素。再加上生活環境的種種限制，無家者很容易放棄連帶，而連帶一旦斷裂，無家者更印證原本看待公園連帶的既定印象，認為這裡的人不值得結交，形成看待與運作連帶之間的惡性循環。另一方面，無家者與幫助網絡間的連帶也進一步促使無家者變得危殆。這類連帶的運作雖然為無家者帶來物質資源，但在象徵層面上卻使受助者尊嚴降低，因為隨著連帶的運作，助人者與受助者兩個群體的界線將更清楚，愈難形成穩定、平等的關係，同時深化社會對無家者的既有污名。

於是，本書提出一個重要命題：貧窮是關係性的。貧窮不是發生在不努力的人身上，而是發生在對關係帶著特定看法，以及在關係中被以特定方式對待的人身上。不是物質或個人意願使人貧窮，而是關係以及運作於其中的政治使人貧窮。本書藉用社會世界及象徵政治這兩個重要的理論傳統，來說明貧窮何以是關係性的。

貧窮的真實面貌與貧窮的象徵政治

《危殆生活》一書延續社會世界理論的傳統，細緻地呈現公園無家者真實且動態的生活面貌，使我們看見無家者如何在困境中主動採取各種有意義的行動。大眾媒體往往將無家者視為都市之瘤，而學術研究雖破除一般媒體對無家者污名化的想像，但仍將無家者視為特定結構下的受害弱勢群體，是有待修正的社會問題。有別於大眾媒體及既有學術研究，黃克先在本書中做的是進入無家者的社會世界，看見他們的真實處境所帶來的限制，以及如何在處境之中掙扎求生存，以各種不同的策略進行勞動、建立連結。在這樣的觀點下，無家者是積極的行動者，對自身處境有獨特的理解，並依據這樣的理解做出行動，書中寫道：無家者「雖身處困難的生活處境，仍形成一種具獨特思考與生活方式的『貧窮文化』與認同，懂得如何與汙名身分共處、有創意地賦予自身處境正向意義，並技巧性地展演特定生活風格以換取尊嚴」（頁 278）。

然而，黃克先並不過度浪漫化無家者的行動，而是指出這些行動很多時候並未真的帶來出路，主體能動的展現只是漫長且延續的危殆生活中閃現的短暫時刻。無家者活在物質基礎匱乏、露宿的不確定性、未獲社會制度支持的狀況下，連帶變得脆弱易斷。失去連帶的主體可能永遠難以逃脫不斷來回於收容機構、街頭、暫住所的循環宿命。本書所呈現的無家者既不是罪惡，也不是被動的受害者或英雄，他們只是在困難處境中，為生存而算計，也為維持互惠與尊嚴而付出，以及在這過程中不斷重新面對困境、與之協商的真實的人。

此外，《危殆生活》援引象徵政治理論來說明貧窮何以不只是物

質問題。布赫迪厄相信，要充分說明社會階級就必須將象徵資本的面向納入考慮（Wacquant 2013）。主流社會與無家者形成了「助人—受助」連帶，因此無家者在接受幫助的時候，同時也進入彼長我消的象徵政治。書中提供了許多例子，例如政府福利審查的機制，宗教團體試圖改造無家者，或是聖誕節時到公園發送物資的年輕人也想確認誰是真的無家者，因為「愛心不想被浪費」。這些機制背後反映的是這個社會對於經濟弱勢者的想像，認為社會存在一批不事生產、專做福利詐騙或愛心詐騙的道德瑕疵者或罪犯。這些審查創造出一種優劣階序的連帶，犧牲受助者的感受、尊嚴甚至於真實需求，以滿足助人者本身的個人牟利目的或是優越感。作者指出無家者接受幫助的同時，在幾個面向上受到傷害，包括自我形象與社會地位的再降低、謀生實作上對救濟的依賴、無家者間彼此的連帶更脆弱，而這三個面向會互相強化。或許說有家之人其實積極地鞏固無家者的艱難處境、劃分無家者與主流世界間的差異、在互動之中使無家者持續成為社會問題，也並不為過。

社會學裡的民族誌有兩個重要的傳統：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及延伸個案法（Extended Case Method）。這兩個傳統在案例（case）的定義以及主要對話理論上都有所不同。紮根理論強調由 ethno-narratives——內在於田野中、存在於行動者間，由各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過程所維繫的敘事——出發，先從這些敘事建構出田野的社會世界後，再開始進行理論建構。延伸個案法則恰好相反，由理論來界定案例，將民族誌田野視為重新思考既存理論中隱含的案例的途徑。紮根理論常與社會世界、現象學、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對話，而延伸個案法的對話對象經常是新馬克思理論以及布赫迪厄的理論（Tavory and Timmermans 2009）。《危殆生活》令我覺得耳目一新的地方在於，它在做法上雖然似乎接近於延伸個案法，但同時融合了社會世界理論以及布赫迪厄的象徵政治理論。在這些基礎之上，能讓讀者看見貧窮的真實面貌，同時細緻地剖析人為何即使努力也無法擺脫貧窮，為何接受幫助可能讓人更加

脆弱等重要問題。

貧窮的本土情境與可能的出路

《危殆生活》裡的許多關懷都看得到芝加哥學派及布赫迪厄理論的影響。然而《危殆生活》既與西方社會學文獻對話，也說明了在台灣脈絡之下無家者社會世界的特殊情境。我尤其欣賞作者透過台灣無家者社會世界的特殊情境所提煉出來的「江湖資本」此一概念。這個概念既回應布赫迪厄關於習癖（habitus）的討論，也是從在地脈絡發展出來的獨特貢獻。相較於西方社會中的「街頭」，黃克先指出華人世界相對應的空間可說是「江湖」：一個缺乏國家公權力介入或仲裁、不按主流意識形態運作的社會情境。我喜歡作者對「江湖」的文化意義分析：江湖帶水的意象代表著高度不確定性、機會豐沛與風險潛藏並存的次文化世界。無家者向來與水的意象相連，在日治時期被稱浮浪者，直到今日民間仍稱流浪的，漂泊一詞也常用來指涉無家者的生活狀態。無家者擁有不同的「江湖資本」：「一種身體化的互動展演能力……雖在主流社會中具汙名而無法兌換為正向肯定，但有助於行動者在街頭或江湖這樣的空間下，於次文化群體裡取得象徵地位……藉此取得對方的信任或服從」（頁 58）。無家者的社會世界之中，「迢迢人」指的是離家入江湖的人，他們早早離開家庭與教育這些主流體制內的軌道，進入複雜的工作職場、幫派主導的地下社會，長期在「江湖」中打滾，因此累積了豐富的江湖資本。「江湖」也是無家者主動援引來成就自己人生敘事的資源，例如不少無家者會以布袋戲裡的俠義世界觀，自比為半神半人的虛構人物，藉此賦予現今處境特殊意義。

《危殆生活》重新思考貧窮文化，說明象徵政治在貧窮中的重要性，也因此提出關於無家者的政策建議。既然問題不在連帶的多寡，而是無家者如何看待與運用連帶，那麼，打造較為穩定、平等、正向的連帶，將是能夠幫助無家者適應外在環境的政策。依此觀點，作者提出政府應正視無家者的居住問題，並且關注無家者權益的公民團體

此二行動方向。

一則名為「中產家庭」的都市傳說

閱讀《危殆生活》之後，我想到有待進一步研究的一個相關議題，亦即「家」與「街頭」這一對概念的形成。在西方社會，家與街頭／公共空間是於現代早期（Early Modern Era，十八至十九世紀）一起形成的一對概念。在現代早期，社群力量逐漸由家退出的同時，現代親密的、以小孩為中心的家內空間逐漸成形；相對地，街頭與陌生人則慢慢變成不可信任的、有待處理的社會問題。家與公共空間的這一對概念形成現代人理解世界的一套基本工具，這一對概念會出現在關於家和街頭的常識之中，而常識會具體化並加強這一對概念。舉例來說，美國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認為貧民窟家庭是社會問題，只因為他們違反家庭生活與街頭的分界而被視為野蠻落後。關於這些家庭有一整套的迷思與街頭傳說，而這些傳說本身就合理化了這些家庭的可責性，於是這類街頭傳說不只表達出對街頭的恐懼，也同時加強家與街頭的二分，而形成一種社會控制（Miller 1997）。

《危殆生活》一書也提到，無家者的出現與現代性的打造密切相關。日治時期國家開始用積極的手段來治理無家者，將之視為罪犯或偏差者來懲戒或教化。城市裡運用綿密的體制，將偏差群體納入機構，藉此不再只是消極救濟或回應犯罪，而是積極防貧並預防犯罪。1949年後來台的國民政府繼承這一套現代國家治理無家者的技藝，以處理散兵游勇為主要目的。1973年台北市訂定《台北市取締遊民辦法》，取締對象變為無業遊民、乞丐與精神病患，此辦法至1997年《台北市遊民輔導辦法》通過後廢止，為台灣遊民政策福利化的濫觴（頁203）。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一段整治公共空間的歷史，與家空間的關聯是什麼？如果如前段所述，在西方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家與公共空間是一組一起形成的概念，那麼，台灣從日治時期開始，經戰後到1990年代，當公共空間逐漸為體制所深入和監視，成為可見的空間，家這個空間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家與公共空間是否也

形成一組現代台灣人理解世界的基本工具、出現在關於家和街頭的常識之中，甚至形成一種社會控制？這一切又是如何運作的？

前述的這些提問並不單純是對於家空間的好奇而已，而是能夠與本書所說的象徵政治相扣連的問題。《危殆生活》提到的聖誕節到公園做愛心的「善心人士」令我印象深刻，那些拿著單眼相機、裝扮應景的人試著辨認哪些人是真的無家者，而被他們選中的人往往是衣衫襤褸、身心功能明顯不佳、白髮蒼蒼的年邁者；背後似乎自有一套關於街頭的常識在運作。相對於中產階級、手拿單眼相機、帶著小女童，有能力組織家庭的自身，善心人士們是否將生活在街頭的人想像成與自己完全沒有共通點的他者，因此只有符合他們想像的人才會被認為是無家者？這樣的一套常識或許不只是善心人士所獨有而已，家與街頭的二分可能也是無家者理解世界的框架。《危殆生活》提到無家者會以各樣仿效卻又異於主流社會的方式打造私領域連帶，因此，梳理家與街頭這一組概念的歷史及其內涵，對於本書從同情政治及貧窮文化延伸而來的象徵政治，也許可以形成另外一組理論資源。

近幾年有不少觸及家庭與階級的文學作品和「社會書」出版，例如：《捕霧的人》（黃曄婷 2016）、《我的黑手父親》（謝嘉心 2021）、《卸殼》（江佩津 2020）。我深愛《卸殼》以「殼」為喻，說明家既提供一個容身之地，但也是沉重的包袱，讓人得背著它艱難地行走。這一代的寫作者出生成長於 1980 到 90 年代，黑手變頭家在他們成長的年代已然成為神話，他們的書寫揭露了以子女為核心的中產家庭並不是理所當然。「中產家庭」似乎已經成為一則都市傳說，在這一則傳說之下，人們以中產家庭為生活樣板，而這套理應如此的生活想像卻掩蓋背後的真實：為了拼裝出一個中產家庭的樣貌，其實許多家庭成員，包括小孩，可能受到各種無情力量的擠壓；而有家與無家之間的距離，並不像這一則傳說想說服我們的那麼遙遠。我訝異於這一群寫作者的早慧。然而，或許家空間只是現代化的縮影之一，我們才剛開始回頭認識它。當聖誕節成為常識、只有某一種人才會被辨識為無家者，這套常識背後「家」的建構與裂解的真實過程，

我認為很值得深入探討。

真實存在卻被視而不見的街頭日日

《危殆生活》寫出了無家者豐富但危殆的連帶，真實存在卻被視而不見的街頭日日。除了理論與實務上的貢獻，這本書關於無家者日常的民族誌描寫也非常引人入勝。我一直認為，敘事並不是理論分析之餘的點綴，好的敘事本身就是一種透過重現社會生活細節所進行的分析。特別是對於無家者這種被視而不見的日常，「重現」本身就具有「使原來不被看見的得以被看見」的政治性。《危殆生活》提供了不少這類具有分析功能與政治性的好敘事，例如，出於強烈的助人欲望，在下港欠債前來公園想打零工的阿壹，有天領著作者和坐輪椅的阿賴，前往市場說要一起吃飯，買單之外還堅持要作者和阿賴點湯。然而，回程路上阿賴和阿壹竟發生了阿賴到底有沒有欠阿壹一百塊的爭執。原來阿壹推輪椅回公園時對阿賴說了一句：「啊那你今天這樣欠我一百塊喔！」想要助人、希望能占據助人者的優勢位置，即使過程中意志游移，阿壹仍然堅持要請客。阿壹請客的行動說明對無家者而言，生活中最奢侈的事物之一就是肯認。這個請客行動再次說明作者的核心觀察：缺乏穩定經濟支持下，無家者即使有心助人，其助人行為也顯得危殆。作者細膩的書寫揭露無家者的困境與掙扎，使無家者的世界與其中的人物一個個真實而立體地躍然紙上。阿壹的好事之旅，已經和《人行道》一書中，紐約第六大道賣回收書的無家者利用一次性咖啡紙杯當街小便一樣，成為我心中經典的場景了。

本書是一部細膩且具有理論深度的民族誌書寫，並且提示許多有待進一步探索的議題，它是值得每個對於都市民族誌、家與公共空間、底層生活有興趣的人閱讀的書。

參考文獻

- 江佩津，2020，《卸殼：給母親的道歉信》。台北：大塊文化。
黃暉婷，2016，《捕霧的人》。台北：九歌。

謝嘉心，2021，〈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台北：游擊文化。

Bourgeois, Phillipe. 1995.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eier, Mitchell. 1994. *Sidewalk*.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Miller, Leslie J. 1997. "Safe Home, Dangerous Street: Remapping Social Reality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p. 3-23 in *Social Problems in Everyday Life: Studies of Social Problems Work*, edited by Gale Miller and James A. Holstein. Greenwich: JAI Press.

Tavory, Iddo and Stefan Timmermans. 2009. "Two Cases of Ethnography: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Ethnography* 10(3): 243-263.

Wacquant, Loïc. 2013. "Symbolic Power and Group-making: On Pierre Bourdieu's Reframing of Class."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3(2): 274-291.